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演变和共产党的政策

张光宇 钟永恒

国民党左派的历史是第一次大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对它的政策则直接影响国民党左派的演变乃至第一次大革命的进程。本文就此作一探讨,希冀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历史。

(一)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组织演变比较复杂,有过重大的分化和组合,大致经历了形成、发展、受挫、复兴和分化四个阶段。

国民党“一大”至“中山舰事件”之前,这段时间是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反帝反封建政纲,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这次大会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并且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左派的正式形成。

左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左派人物是孙中山的亲信干部,他们参与了国共合作的谋议,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后来发展的方向也各有不同,但在当时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三大政策是拥护和执行的。这时期的左派代表人物有廖仲恺、汪精卫等人。

廖仲恺是坚定的左派领袖,他长期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对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在最为关键的联俄政策方面,孙中山主要是依靠廖仲恺联络实现的。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即受孙中山委派赴日本热海与越飞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商讨有关联俄联共的具体方案。10月,鲍罗廷到广州后,廖又成为与鲍罗廷等苏联顾问接触最为密切的国民党领袖。同时,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筹改组事宜。在廖仲恺的主持和参与下,临时中央执委会于1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国民党党纲草案,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大”会议上,廖是以广东代表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的,参加了会议的领导

工作。他贯彻孙中山的意图，坚决抵制那些企图取消宣言革命内容的错误意见，使大会顺利通过了“一大”宣言。“一大”之后，廖亲筹办了黄埔军校，担任军校党代表。在党内，他既是中央执行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又担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还一度担任广东省省长，握有实权，不仅是左派的核心人物，也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

汪精卫，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名望甚高，与胡汉民合称孙中山的左右手。最初，汪精卫对国共合作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生命“定要危险”^①。但当孙中山坚决表示要改组国民党时，汪即赞成国共合作，并参与谋划。在“一大”会议上，汪发言反驳了右派言论，表示支持国共合作；之后，“汪对当时国共合作政策始终毫无间言，热衷拥护，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奉国际代表若神明”^②，并以左派面目出现。因此，当时汪也被视为左派领袖之一。

在左派形成发展阶段，中派胡汉民、蒋介石、许崇智等与左派关系密切，对左派影响很大。

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一般说来，中派同意改组国民党，但对三大政策的态度有左、右倾之分。中派之右倾分子同意联俄、反对联共，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联俄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帮助，而联共则有失去领导权的危险。他们对扶助农工政策持反对态度。中派之左倾分子对改组国民党、对三大政策的认识 and 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在言行中表现出来的主流是赞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左派经历了一个重新组合的过程，其主要变化就是胡汉民由中派左倾转为中派右倾，并逐渐转化为右派。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身亡，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廖案及时局的“特别委员会”，拥有“政治、军事、警察全权”。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被推为委员。

经过侦破，发现属胡汉民的“元老派”诸人，如胡毅生等直接参与了谋划刺廖，还涉及胡汉民本人，粤军部分将领也有嫌疑。8月24日，蒋介石宣布就任广州卫戍司令，控制了广州，并将许崇智部陆续缴械收编；9月19日，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许崇智总司令部，致书劝许暂行离粤，声称“俟介石将一切乱事及不肖分子扫平之后，再请回粤主持，为期仅三月而已”^③。对蒋的行为，汪精卫是支持的。所以，当许崇智电询汪精卫时，汪称：“余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④。许崇智被迫于9月20日晚搭船离粤赴沪，而蒋介石作为粤军参谋长负责“所有该部收束事宜”^⑤。

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汪精卫借助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保持了政治领袖地位，而蒋介石则借助汪精卫的政治庇护，挤走了许崇智，成为军事首领，从而形成了汪蒋合作的格局。但是蒋介石的地位并没有为国民革命军其它将领所承认，只是到了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汪精卫为政治首领、蒋介石为军事首领的格局才在政治上确认下来。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后又任命为全国陆军总监，“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⑥。

但是，两个重心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蒋介石的右倾，发动中山舰事件，赶走了汪精卫，国民党左派也就陷入受挫阶段。

左派的受挫阶段是指中山舰事件之后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这段时间。这个时期，左派受到已转入为新右派的蒋介石的压迫打击，呈现出组织涣散、工作不

力的状况。

蒋介石经过对廖案的处理和第二次东征，实力大增，其政治思想和立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要取得共产党人的支持并得到苏联军械，表面上仍主张联共、联俄，但在内心里，对联共、联俄政策已产生对立情绪。他认为“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⑦；4月9日，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军事陷入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也。”^⑧

而汪精卫“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以鲍罗廷走后，在对俄顾问的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⑨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表现出明显的激进。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⑩。在“二大”会上，多次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6年2月1日，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为第一、二、三军副党代表。22日，汪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八周年联欢会上演说：“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镌之中心而已”^⑪。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曾命令王懋功“严厉制止”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3月初，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的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

这样，蒋、汪冲突愈演愈烈，其结局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赶走汪精卫，使左派群龙无首，呈现挫折局面。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后即隐去，并于5月11日离粤。于是“一般左派群众，一部分根本动摇，行动右倾；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无法以解决现状，彷徨无主”^⑫。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原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组织部长谭平山，代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均以身为共产党员被迫辞职。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至此，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左派进入复兴阶段。

左派复兴的重要体现是，在与蒋介石新右派的斗争中形成了新的核心人物，加强了组织性。在复兴阶段左派的核心人物除宋庆龄、何香凝外，邓演达的地位无疑是特殊而重要的。邓演达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两湖战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9月7日，邓演达被蒋介石任命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在武汉代行总司令职权。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⑬。此外，徐谦的地位也很重要。徐谦是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当时与邓演达并称”^⑭，“是当时真心拥护孙中山遗志，拥护仲恺坚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的主张的人”^⑮。他们俩人在收回汉口英租界、反蒋斗争、坚持国共合作等重大事件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左派不满蒋介石新右派独揽大权、排挤共产党、压迫打击左派力量，希望汪精卫回国主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复兴左派。1926年7月，左派主持的一些国民党省市党部纷纷电请“汪精卫销假视事”^⑯。10月，左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要求汪精卫“即日销假视事”。“左派领袖们在此次大会中已企图由思想的倾向渐渐形成一种形式的组织，并特别规定了他们的政纲四条，在此四条政纲之下，团结各省左倾分子，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和中派、右派竞争。其政纲四条是：（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

（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①

复兴的左派，形成了以邓演达、宋庆龄、徐谦为政治首领的左派中心，有张发奎、唐生智的军事力量为其支柱，开展了反蒋斗争和迎汪复职运动，造成了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革命高潮。但是，左派的复兴带有许多异化的基因，反蒋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对汪精卫的本质也认识不清，最终使左派发生分化，一部分分化成汪精卫假左派集团，一部分则是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为首的真正左派势力。

汪精卫假左派集团是在4月底左右形成的。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在迎汪复职运动的召唤下，从法国经莫斯科转海参威回到了上海，随即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就分共问题进行了秘密会商。因为上海为蒋所控制，为了与蒋争权夺利，汪精卫离沪去汉，4月10日到达汉口。

汪精卫初到武汉，为了站稳脚跟，曾迎合武汉的反蒋情绪提出了“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政治口号。但就在这种左派面目的掩盖下，汪精卫拉拢了陈公博、甘乃先、顾孟余、孙科等，迅速形成了汪精卫集团，并拉拢取得了唐生智和张发奎军事集团的支持，掌握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大权。

汪精卫集团形成后，即着手实施破坏三大政策。4月底，在汪精卫的授意下，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查办了湘、鄂、赣各省的所谓“过激”言行。5月1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否决了土地委员会制定的、以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为主要内容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从根本上抛弃了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庇护反动军官，放纵叛乱军队，镇压工农运动。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张发奎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酝酿分共，并在军事上作了部署。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清共”，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汪精卫假左派集团完全叛变了革命。

相对汪精卫假左派而言，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真正左派势力比较薄弱，组织上也显得松散。所以，对于汪精卫假左派反对三大政策的倒行逆施行为，他们曾奋起抗争，但终因力量单薄而没能挽救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继续坚持民主革命立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开展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反动统治的斗争，成为民主党派的先驱。

（二）

国民党左派的演变虽然主要是由其内部的因素决定的，但共产党对它的政策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如何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从国民党“一大”至北伐战争前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党对它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的最早认识见诸1924年5月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这次会议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②。从而初步明确了国民党左

派的基本成分，认清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和左右两派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且明确表示，在左右两派斗争中，“共产党自然在孙中山及现时愿意实行已通过之‘宣言’里的政纲的一派方面”^{①9}。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首次指出了国民党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性质：“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②0}从而明确了国民党左派所代表的阶级成分：“左派的成份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激进分子。”^{②1}进而使支持左派的政策更为具体，提出：“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②2}。“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②3}。“为在国民党中央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②4}。“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应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②5}。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发起了征求党员运动。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九号通告，指示全党：“在此次征求党员运动中，我们的同志应特别努力”，“扩充左派党员之数量，是我们日前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内最紧要的政策；为实现此政策计，有必要时亦可在工人区域发起国民党的组织”^{②6}。5月5日，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第三十号通告，提出了“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的具体办法^{②7}。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初步分析了左派的特征：“所谓左派，单是一时的论调左倾是不够的，必须是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实际的政治主张上，不但和反动派不同，并且确与右派不同，尤其是与共产派亲密结合这一点，是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左派之特征”^{②8}。进一步提出了与左派结成联盟的政策：“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②9}。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第六十五号通告中指出，在与右派斗争中，应“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③0}。12月2日，中共中央在第六十六号通告中，又提出：“我们急须助左反右，各地急须发起三民主义学会，此项学会不但是左派的宣传机关，同时就是左派的组织。在左右派势力并存的地方，我们即据三民主义学会和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抗”^{③1}。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大”。早在大会前的1925年4月，中共中央即提出，只有扩充左派势力，“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③2}中共中央在第七十六号通告中指出，在这次大会中，“左派与共产派的关系非常之好，双方并没有什么意见，仍一致的协作”，“我们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宣传左派的成功，宣传大会的一切材料，就是宣传左派思想和政策。”通告着重提出，我们“仍当继续从前的政策，与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左派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同时，又要到处巩固我们的党，因为左派的发展是要以C.P.（即共产党）为核心的，离开了C.P.，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③3}。“这次大会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我们以后更应努力扩大左派的群众，坚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也就是坚固国民革命的进行”。“发展左派仍当以C.P.为核心，同时要扩大巩固C.P.的组织，因为离开了C.P.，一个国民党的左派是不会形成的。”^{③4}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继续提出“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的任务。

由上述可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的认识在逐渐明确，对左派的

政策也逐渐具体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党不仅明确了要与左派成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而且明确了共产党应站在领导地位来联合左派，成为左派的核心，表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相当明确的。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因而促使了左派势力不断扩大，国民革命的形势呈现发展的趋势。当然，这个阶段对左派的政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1926年5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百零一号通告认为：“从三月二十日的事变可见左派内部尚有许多误会，几乎动摇国民党联俄联共的根本政策，几乎演出太平火并的悲剧！”^{②6}错误地把蒋介石、汪精卫看成为左派，以致在处理“三·二〇”事件中犯了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

从北伐战争后至“四·一二”政变为第二阶段。在这阶段中，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是正确与错误各半。

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对左派的认识上正确与错误都存在。“三·二〇”事件之后，蒋介石已由中派转变成了右派，但这次会议仍错误地把他作为中派的代表。当然，会议不再把他列入左派还是正确的。此外，会议把汪精卫、甘乃光当作左派的代表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当时虽政治上左倾，但并非真正的左派，而是假左派。在左派的政策上，这次会议提出：“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②7}。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会议批评了共产党“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的观点，提出：“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②8}。这种政策必然产生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对新右派实行退让妥协的不良后果。这次会议改变了共产党站在核心地位来联合左派同右派作斗争的政策，使自己退到后台去。这就使这次会议成了对左派政策的转折点——由基本正确转向正确与错误各半的状态。

9月10日左右，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委员暨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9月16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的第十七号通告。一方面，正确地提出：“此次大会主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为左派行动的标准，逼中派承认此政纲施政”，“各地国民党左派党部，应努力与民众接近，宣传中山北上宣言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政纲，如此扩大左派的政治势力，然后在国民党中央十月一日的会议上，左派的势力才有政治的社会的基础。”^{②9}另一方面，又提出“汪蒋合作”的错误主张，支持迎汪复职，“使汪能主持国民党”，但“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③0}，企图维持“汪主政、蒋主军”的格局。

1926年下半年，共产党内部对国民党左派的认识出现了新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内有没有左派这个问题上。广东的同志否认国民党有什么左派；参加国民党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同志否认有真正的左派，只承认国民党中有“准左派”。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批评了上述两种意见，认为国民党内确实有左派存在，指出蒋介石个人专制局面下国民党左派的状况是：左派唯一的首领汪精卫远适异国，不知踪迹；一部分左派领袖如顾孟余、丁惟汾、陈公博、孙科等已对共产党表示怀疑，开始发生根本动摇，行动右倾；另一部分左派领袖如何香凝、宋子文、甘乃光、陈友仁等还保持真正左派的面目，他们不满于现状，要求有所改变，但无法解决现状，彷徨无主，要共产党为之领导。同时，针对鲍罗廷的“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说法，中央首次提出了判明国民党左派的标准是：“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③1}。中央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中央决定帮助左派“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

(不是独占)，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④，这实际上是把领导权让给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假左派。

1926年12月在武汉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标志着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都武汉。这个临时政府实际上是由左派领导的革命政府。中共中央对它持支持态度，指出：“国民政府及K. M. T. (即国民党)中央移汉后，合组一临时委员会，维持这个政府，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⑤。中央的政策是对的。

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左派会议，这次会议反对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高了党的权威，坚持了三大政策，加强了国共合作，支持了农民运动，会议是开得成功的。这是共产党联合左派、团结中派、反对右派斗争的胜利。

从“四·一二”至“七·一五”为第三阶段，在这阶段中，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

1927年4月初，被中共中央视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了武汉，控制了武汉的党政大权。“四·一二”政变，尤其是夏斗寅叛变之后，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始由动摇走向反动，但当时中共中央却对它们存在不切实的幻想，完全依赖它们，错误地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标志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武汉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⑥。武汉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联盟的政府”^⑦。认为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左派领袖，应以拉住汪精卫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与此相反，中共中央对武汉时期的真正左派却不重视。邓演达是武汉时期著名的左派领袖人物，但中共中央对他的革命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他的缺点看得过于严重，进行了过多的责难。正如周恩来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⑧

直到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后，中共中央才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左派。当汪精卫酝酿反共之际，6月30日，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留别书，谴责汪精卫的叛徒嘴脸：“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在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⑨，随即秘密离开武汉，前往苏联。7月14日，宋庆龄写成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⑩随即离开汉口，前往上海。鉴于此，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中指出：“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指示说：“我们现在要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⑪。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左派的政策问题，是处理与同盟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还缺乏经验，还处在探索阶段。所以，如同其他政策一样，对待国民党左派的政策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验教训主要有两条：一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能颠倒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位置，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是对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的分析不能犯“定型化”和“公式化”的错误，必须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无论经验也罢，教训也罢，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下转第71页)

